

# 新东亚地区主义:探索、挫折与出路

## ——兼论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的政策摇摆

唐永亮 白如纯

**摘要:** 作为实现全球化的过渡形态,地区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中充当着桥梁角色。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新东亚地区主义”出现,并随着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其内涵不断丰富。日本作为探索东亚地区主义较早的国家,对东亚区域合作进程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日本的区域合作政策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异变趋势。安倍政权热炒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可能会对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消极影响。构建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对维护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大局意义重大。

**关键词:** 地区主义 新东亚地区主义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TPP RCEP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体现为“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并行不悖。世界各国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进程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紧密而有效的合作。其特点是以区域内各经济体为基本协调单位,通过签署多边、双边协议的方式来实现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提高整个地区的国际竞争力。

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形成、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日本调整东亚区域合作政策,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前景将产生重要影响。遗憾的是,近年来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出现前后矛盾的摇摆状态。继与中国主张的“10+3”框架发生矛盾,力主“扩版”区域框架为“10+6”之后,安倍第二次组阁以来更加大火力,热炒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使得本来更易操作的中日韩合作,以及磨合

多年、硕果仅存的以东盟为中心的“10+3”合作,出现停滞甚至面临功亏一篑的危险。

### 一、继承与发展中的新东亚地区主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存在盲目性、无控制性特点。在特定条件下,经常会酿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地区主义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合作中充当着缓冲剂的角色。作为地区主义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通过采取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合作策略,而成为遏制上述劫难的制动器。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等诸多方面总体目标一致,绝大多数国家合作的愿望强烈。这是笔者之所以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必将继续大有作为的前提,东

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将是东亚地区主义得以维系并不断深化的基础和平台。

### (一) 扩容的东亚成为地区主义的依托

二战后的东亚地区主义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产生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二是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

东亚地区的范围和概念是存在争议的。探讨东亚地区主义,有必要先明确作为基本概念的东亚区域范围,即所包含的国家与地区。迄今为止,有关东亚所指范围出现过多种版本,除了自然地理学的概念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又赋予了东亚地区新的内涵。

传统地理学把亚洲分为东亚(中国、朝鲜、韩国、蒙古、日本)、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和北亚。从自然地理学范畴来看,广义的东亚是指欧亚大陆太平洋岸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狭义的东亚是指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

东亚在战后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重新崛起,东亚的界定也随之出现了新变化,即主要指大中华圈、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盟十国,这大体上是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sup>①</sup>例如按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的与会国计算,东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东南亚+东北亚+大洋洲+南亚的印度”,这使得东亚国家的数量陡然增至16个。直至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10+8”体制取代了“10+6”框架。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成员国数量似乎也会进一步增加。<sup>②</sup>

### (二) 亚洲金融危机催生新东亚地区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泰铢暴跌为发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出现新变化。东盟(ASEAN)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在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中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以东盟为中心、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平台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新东亚地区主义”的直接表现。即该阶段的东亚地区主义由东南亚扩容到整个东亚。

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在东盟主导的框架内强化了合作关系,在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态度日趋积极。区域内各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之中。各种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不断涌现,逐渐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概括“新东亚地区主义”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不搞“主权让渡”,平等参与和协商,保证各国主权和利益。在合作内容上从务实需要开始循序渐进。合作进程更多体现为“功能主义建构”特征。

2. 东盟地区合作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基础和驱动器。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为中小规模,且长期分裂、经济不发达。一个联合起来的东盟与中、日这样的大国对话与合作,可以体现出很大的平衡。通过建立区域合作机制,将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各异、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区域合作框架中,东盟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东盟模式延伸到东亚具有重要意义。

3. 实行“开放的合作主义”,不采取“东亚至上”的内向思维。在东亚地区各国间合作的同时,承认利益差别,鼓励多层努力,允许和鼓励各国与地区外

① 关于东亚范围概念,国内有关辞书解释如下(按时间顺序):《辞海》(1979年版)中释为亚洲东部,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包括南朝鲜)和日本;《世界地理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中释为亚洲大陆的东缘,东濒太平洋,边缘多群岛、半岛,通常指中国、蒙古、朝鲜半岛;《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释为亚洲东部,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中国百科大词典》(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中释为亚洲东部地区,包括中国、蒙古、朝鲜和日本。

② 首届东亚峰会于2005年12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当时除16个正式与会国首脑外,俄罗斯总理普京首次作为嘉宾出席。

国家进行合作。使区域合作不带有封闭性和对抗性。经济上表现为多层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安全上则承认和保留现有的双边合作乃至结盟关系。

4. 区域组织建设相对缓慢。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和平,因此重在功能性发展。虽然东亚地区发展了市场导向的区域联系与利益机制,但是缺乏稳定的区域制度化安排。事实上,东亚国家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与现实的分割,需要通过发展新的地区主义,寻求自身的内在逻辑,不将反西方作为合作的出发点与动力机制。<sup>①</sup>

关于“新东亚地区主义”意识的源起,更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了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设想,被称为当代新东亚地区主义的先驱之作。由于日本态度暧昧和美国的极力反对,马哈蒂尔设想未能实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各国普遍认识到一厢情愿依靠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依靠区域内国家的联合,才能有效面对难题。东亚区域合作正是在这种新的意识即“新东亚意识”基础上产生的。东盟国家提起并推动了“东亚新地区主义”构想。为加强同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东盟不再像以前那样突出东南亚的整体性,而是主动将自身作为东亚的一部分。

2000年以后“新东亚地区主义”进入发展时期,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出、谈判及签署为标志,以东盟为中心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上,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16国首脑在吉隆坡签署《东亚峰会宣言》,东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此后,东盟与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分别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三) 一体化潮流助推新东亚地区主义

地区主义的形成一般应满足如下要素:相互连接或接近的地缘环境;密切关联的经济利益;共同的安全保障目标;以及核心国家的积极推动等。东南亚和东北亚成为地缘接近、相互联系密切的整体,“大东亚”业已成为亚太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一体化潮流使新东亚地区主义旗帜下的东亚区域合作得以快速推进。

1. 东南亚一体化发挥领跑作用。“东南亚地区主义”曾是东亚地区主义的主要载体,东盟(ASEAN)也是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较为成功的范例。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小国和弱国,要想在大国争雄的夹缝中生存和发展,东盟通过独特的集团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用有限的资源和实力去实现地区以及各自的国家利益。<sup>②</sup>

尽管覆盖整个东南亚的地区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最终没能形成,但以1967年的东盟成立为标志,“东南亚地区主义”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并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独特性。首先,东盟成员国共守的行为规范,建立在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之上。要求成员国之间必须遵循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平解决内部争端等基本准则。其次,东南亚地区主义是一种开放式的地区主义,起初并不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而是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协调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进一步达成安全上的合作。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事实上的领跑者。

2. 追求经济利益成为直接目的。与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区域合作机制一样,东亚地区正在推进的区域合作机制,也是以实现共同的经济利益作为目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打击最大的东盟国家和韩国等,从痛苦经历中汲取教训,开始寻求东亚国家间直接的经济合作,东亚

<sup>①</sup> 张蕴岭《探索东亚区域主义》,《当代亚太》2004年第12期。

<sup>②</sup> 杨丹志《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政治基础》,《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合作机制由此产生。

3. 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成为内在凝聚力。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东亚地区占有重要地位,也成为维系地区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文化统一从来就是政治统一的先决条件”。由于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所以即便是印尼和马来西亚这样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国家,以及天主教文化盛行的菲律宾,通过华人秉承的儒家文化管道的沟通作用,各国逐渐将自身的主体文化与地区经济利益相结合,并经长期磨合逐渐内化为某种区域意识。

4. 东亚区域合作能够顺利进展的前提是各国政府相互协调和通力合作。每年一度的东亚首脑会议,成为本地区各国政府间相互沟通和寻找新的合作机制的平台。通过建立合作机制,由各国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才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新地区主义旗帜下的东亚经济合作对缓和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具有现实意义。

## 二、日本地区认识的缘起与政策取向“跑偏”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和世界经济强国,在区域合作方面也较早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东亚地区主义产生初期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以东盟成立为标志的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发生与发展,也可以称为“东南亚地区主义”;二是日本在完成战后经济恢复,进而实现高速增长后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努力,主要内容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投资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在“10+3”框架内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力度不断增强。对战后长期领跑东亚经济的日本来说,不但不愿接受这种趋

势,更不会听之任之,于是日本极力谋求“扩大版”(即“10+6”)东亚峰会,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三国成为首届东亚峰会成员,并一直延续至今。

### (一)“霸主”意识:日本地区政策的原始动力

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在东亚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周边国家和地区愚昧落后的现实,催生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将西方势力从本地区驱除出去的“使命感”,即“地区霸主”的强烈愿望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直接原因之一。

为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扩大势力范围,日本在20世纪初期曾大力倡导“亚细亚主义”、“东亚同盟”等主张,<sup>①</sup>试图以此对抗西方的强势。1941年,众议院议员松冈洋右出版了《兴亚大业论》,提出“振兴亚洲”口号,并认为日本应是“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sup>②</sup>日本近代著名美术家、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思想》一书中,也论及“亚洲一体”的主张。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有过“大亚洲主义”的提法。甚至二战时期恶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也被某些研究者认为是东亚地区主义的早期萌芽。<sup>③</sup>

对概念与事件的考证,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历史学家的结论不尽一致。笔者认为,二战期间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等主张,是建立在以侵略弱国、独霸东亚的野心之上,即使打着以东亚联合对抗西方强权的招牌,也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也证明其主张不为地区其他国家认可,并最终因日本战败导致无果而终。

随着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并重新融入国际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后,小岛清等日本学者再次提出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其后,70年代出现了

① 1943年,大川周明的代表作《大亚细亚秩序建设》一书出版,该书主张由日本建立“亚细亚秩序”。[日]大川周明《大亚细亚秩序建设》,日本第一书房1943年版,第23-24页。

② 《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0页。

③ 青木保、近藤荣一:「アジア・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模索が始まった - 文化からみた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可能性」、『外交フォーラム』2008年4月、第64-69页。

“环太平洋合作设想” 80 年代有了“环日本海经济合作”构想等<sup>①</sup>。随着亚太经济合作逐步得到区域内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响应,并得到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支持,20 世纪 80 年代末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转变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此后一系列合作机制逐步建立。

冷战结束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重新认识到东亚地区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位置,并成为东亚合作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力量。同时,东亚各国也普遍意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开始重视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各层面的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实践陆续展开。日本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为东亚各国所关注。

## (二) TPP 登场,东亚区域合作出现新变数

东亚区域合作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概算到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日本地区合作战略也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外交努力。其设想为,一是以“日本·新加坡经济伙伴协定”(JSEPA)为样本,在东南亚逐步达成与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双边合作框架,最终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二是倡议成立日韩自由贸易区并依次扩展到相邻的国家和地区。由日本牵头,整合东南亚和东北亚两个经济圈,最终形成以日本为轴心的东亚自由贸易体系。

但该设想并未实现。2009 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并力推 TPP,成为日本地区战略调整的新拐点。2010 年日本横滨 APEC 会议前夕,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就曾表示加入 TPP 谈判,遭到民主党内和以农业为代表的相关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为首的经济产业界,希望继续搭乘美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快车”,极力主张参加 TPP 谈判。鉴于鸠山内阁时期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试图逐渐平衡对美依赖,导致美日关系出现波折。2011 年组阁的野田重提 TPP,呼应美国重返亚

太战略以修补美日关系,并借此对工商和经济界做出回应。

2012 年 12 月安倍新内阁成立,其后日本正式宣布加入 TPP 谈判。由于中日关系紧张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在政治上的考虑似乎更多。参与 TPP 谈判,表明日本有意积极履行日美同盟规定的战略、政治承诺。安倍政权则由此获得美国继续提供的战略庇护和政治支持。

关于加入 TPP 的利害得失,日本学界、经济界也莫衷一是。被誉为“财界首相”的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认为,不加入 TPP 日本将沦为世界的“孤儿”。但京都大学教授中野刚志则指出,日美经济规模占目前 TPP 框架内整体经济的九成,TPP 更像是日美 FTA。中野认为,没有中国、韩国等地区主要经济体的参与,TPP 无助于日本重塑经济活力。因此从经济方面考虑,加入 TPP 并不是日本的最佳选择。也有相对温和派人士的观点,认为日本的农业以及产业界体制僵化,如果日本加入 TPP 或将推进体制创新。同时,温和派人士也建议调整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加强与中韩等邻国的经济合作。

## 三、RCEP 或将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新平台

2011 年,东盟提出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草案,得到中国以及相关各方的积极回应。RCEP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美国主导的 TPP 的应激举措,反映了东盟对或将失去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的担忧。东盟谋求增强自身凝聚力,通过稳定发展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并能继续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RCEP 如能实现,将整合并优化东盟与中、日、韩等六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改变规则过多、操作易乱的现状,建成一个高质量的自贸区。从东盟自身利益考虑,既可应对美国主导的 TPP,也是对中日韩计划建立自贸区的未雨绸缪。

<sup>①</sup> 战后日本身份特殊,而且迫于对美国因素的顾忌,日本的区域合作主张大多局限在泛亚太范围。这是因为,实现了经济复苏与高速发展的日本,首先需要建立同美国、西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联系。

与东盟建立自贸关系的东亚六国均表示支持东盟主导建立 RCEP。这是 RCEP 较之 TPP 更易建成的原因之一。一直以来,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在近年来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以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均取得了共识。RCEP 成员国间的开放程度虽然将高于目前各方与东盟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但在协议过程中将根据各成员国具体情况提供适度宽松政策。相对于 TPP 过高的开放要求,显然更容易为各方接受。

按照预计的时间表,RCEP 2013 年初启动、2015 年底完成谈判并进入实施阶段。联系东盟共同体将于 2015 年底建成,东盟维护自身利益进而推动迄今为止的区域合作的意图显而易见。

与此相对照,日本则刻意强调东亚区域合作的开放性,希望与区域外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为此,日本极力推动“10+6”模式,希望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等核心成员,还应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并试图把美国拉入东亚区域合作框架,建立一个由日本主导的“开放的东亚共同体”。这样既可以缓解美国对日本经营东亚共同体的疑虑,又能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介入扩大日本在共同体中的分量。鉴于战后的特殊身份,长期以来,日本遵循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的外交三原则,三者之间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国际背景之下,既有联系又有侧重,决定与实施地区政策的关键,是日本将东亚区域合作置于外交全局的何等位置,以及如何把握日本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有机结合。

实际上,日本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反复与自相矛盾的状况。前日本首相野田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毫不隐晦日本在 TPP 和 RCEP 里下注的心理。日本东亚研究学者西口清胜教授指出,这是日本的“怪异”表现,既表明参加美国主导的 TPP,又想在东亚合作框架捞取好处。RCEP 的成员正是日本版“扩大的东亚共同体”的翻版,日本当年努力的成果如今竟成为东盟与中国主张和主导的谈判与合作框架。<sup>①</sup>

由于日本在领土纠纷与历史认识问题上与中韩等邻国关系持续紧张,重新夺回执政权后的安倍内阁,在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方面依旧处于摇摆状态甚至异变趋势,热炒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可能对新东亚地区主义产生消极影响乃至反动作用。

## 结束语

新东亚地区主义的出路在于是否能满足东亚各国走向合作与开放的愿望,抵消对“全球主义”负面影响的恐惧,为开放的地区主义提供经验,成为走向全球主义的中途站,从而扮演好联结“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桥梁作用。

作为新东亚地区主义载体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需要东盟继续作为列车驾驶员发挥核心作用,更需要作为地区主要经济体的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积极推动。TPP 和 RCEP 都不是某个国家的唯一选项或终极目标,那些参加 TPP 谈判的国家或许对 RCEP 自由化程度有更高的期望。RCEP 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融入亚太合作的转折点,最终将在亚太一体化进程中完成。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唐永亮 副研究员;白如纯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① 西口清勝「野田内閣のTPP 交渉参加表明と今後の日本の進路 アメリカの新アジア太平洋戦略とアセアンのアジア広域経済圏構想の検討を踏まえて」、立命館経済学第 61 巻第 2 号、2012 年 7 月、第 283 - 299 頁。